

从两张毕业证书看70年前的小学学制

□王益来

▶初小毕业证书
▼高小毕业证书

传家宝

赵庭先生在任职时是海安市教科局教科室副主任,退休后的二十多年一直担任教育关工委秘书长。他一生与书结缘,爱书如命,居然从藏书中一次精选出4500册捐赠给大公小学。

赵老告诉笔者,大公小学是他的母校,至今他还珍藏着母校颁发的初小、高小毕业证书。我第一次知道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,还都发毕业证书。我急切地想一睹证书尊容,好长见识。

赵庭先生大公小学初级部的毕业证书,颁发于1951年7月。70多年过去,没有褶皱,基本完好如初。证书中的文字一律毛笔正楷,端庄稳重。尺牍之间展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之美,翰墨

雄浑,古意盎然。

小学初级部,简称“初小”。证书上校长周慎吾、副校长周汝南分别钤方形朱文私印。发证时间“一九五一年七月”处钤“海安县大公小学印”。

证书左侧上方的小框内印有“印花”字样。贴花是税种之一,国民党统治时期,贴花凭证分为4类33目,其中包括有人事凭证类,而毕业证书正是归属于人事凭证类。赵庭先生的这份毕业证书上虽有“印花”位置,但未贴花,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已取消。

赵庭先生1953年的高小毕业证书。设计制作非常精美,五星红旗拥戴着毛主席正面像,红旗分列两侧连接着彩色花边,美观大方,昭示着新中国的教育新气象。

毕业证书的右下方是编号,用蝇头小楷书写“公高字第拾伍号”,表明证书

领取者系“大公高级”小学毕业生。高级小学简称“高小”或“完小”。

由于是高级小学毕业,证书上除盖有“海安县大公小学”公章外,还加盖了“海安县人民政府印”以作认证,可见高级小学毕业证书的分量。该官印方形,阔边,8字印文竖排两行,粗宋繁体,自右至左,每行4字,排列整齐庄重。

证书的左侧与存根相连,写有编号,盖有骑缝章。

这两份饱含岁月印记的小学毕业证书,记录了持证者的人生影像。从这些保存着厚重文化教育信息的文献中,我们可以去记忆那些难忘的历史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)学制改革作了新规,实行“四·二”分段制,即初小四年,高小二年。上文的两份毕业证书表明,新中国成立初期,小学仍采用“四·二”分段制,即1至4年级为初小,5、6年

级为高小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解放不久的党政军面临着千头万绪、纷繁芜杂的各方事务,苏北行署文教处于1950年7月即转发了华东军政委员会规范中小学毕业证书的通知。处长李后民在通知中绘制了证书样图,并就格式、验印等项一一明文规定。笔者对照赵先生的两份毕业证书,完全规范且制作精美。

1952年秋季,海安县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试行“五年一贯制”,其余年级沿用旧制不变。一年后,由于师资、教材等因素停止推行,仍恢复“四·二”分段制。1958年下半年起,县实验小学等校进行“五年一贯制”试点。1980年起,小学逐步恢复六年制,1986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,海安县44个乡(镇、场)入学率、巩固率、毕业率、普及率全部达标。此后,海安教育迈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。



史海回眸

民国间如皋的大疫

□程太和

民国时期,国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虽有疫情报告的规定,但没有认真贯彻执行;只有发生特大疫情,才专件逐级上报。据地方史料记载,民国时期如皋县发生的大疫情有以下几次。

一、1930年西南乡发生霍乱疫情

1930年,如皋张黄港、石南地区霍乱流行。19世纪20年代,霍乱自海外传入中国,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,并向内地扩散。霍乱一词的英文为cholera,西医称之为“虎列拉病”,简称“虎疫”,后来日本人把它翻译成“霍乱”,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,霍乱一词便在我国出现。1930年,霍乱在张黄港、石南地区流行,传染极快,往往有一夜之间全家感染者,路上行人几至绝迹。张黄港、石南地区数十人染病死亡。

二、1936年东乡恶性疟疾流行

1936年9月,在如皋东乡第四(双甸)、第五(岔河)、第六(马塘)、第八(掘港)四个区(现均属如东县,抗战前属如皋县管辖),以及南通县的石港、姜灶等地,发生了一次病情危急,传染迅速,死亡率高的疫病。疫病发生后,因染病而死的人又快又多,民间说是“惹人瘟”,中医说是“湿温时疫”,西医说是“恶性疟疾”。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为突发性寒战、高热和大量出汗,伴头痛、全身酸痛、乏力,烦躁不安。进而神昏谵语,抽搐痉挛。至此,回春者极少。此病一人得之,传染一家;一家得之,大都可能传染附近各家,幸免者仅是少数。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,蔓延不数日,危害几十个乡。其中,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叫“百担圩子”,共有91户,271人,染病人数竟达243人,死亡110人。死亡之惨烈,不忍目睹。2000年12月出版的《南通市志》对此次疫情也有记载:1936年9月,如皋马塘、岔河、蒲西,南通县石港、姜灶等地流行恶性疟疾。南通区专署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乡治疗。南通区《疫情月刊》刊载:“患者近十万,死者逾八千。”这次疫情为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,其原因主要有四点: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,泥墙草屋,房屋面积少,家庭人口多,家庭成员间容易传染;二是底层民众不注重个人卫生,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;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,医疗条件差,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;四是疫情发生后,底层民众对疫病的传染性认识不足,不注重“隔离”与“居家隔离”,甚至还强忍着下地劳动(早期疟疾患者间歇期不规则,经数次发作后即逐渐变得规则。有间日疟、三日疟等),导致病情恶化。

三、1940年城区发生猩红热疫情

1940年如皋县城处于日伪统治下。城区发生一种流行病,中医称之为“疫痧”,西医称之为“猩红热”。这种病主要流行在城镇和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。初起时似流感,恶寒发热,体温大都在39℃左右,鼻塞少涕,口渴心烦,舌干口燥,喜饮厌食,眼睑充血。不过,此病的传染面和传染率均不及1936年如皋东乡发生的恶性疟疾那么凶险迅速,除个别失治者外,死亡的人很少。此病只染成人与老年人,不患小孩,乃其特点。有的一家人染病,因病情相同,用药也就无甚差异。由此,产生了一句谚语:合锅子喝药。当时此病流行,正当夏秋亢热之际,治宜平凉透托,则痧出热退,食欲渐复。这种病状似“小儿麻疹”却有区别:“小儿麻疹”必须用药托齐,甚至辅以“发物”,使患者的头、面、胸、腹、手、足、四肢等布满痧点。而“疫痧”患者则胸、背见红点即可。会不会染上此病,同一个人有无免疫力有密切关系。

四、1946年城区发生霍乱疫情

1946年秋末季节,如皋城区发生霍乱疫情,起初只见一两例、三四例,后逐日增多,传染猖獗,死亡率随之上升,一时弄得棺材店里忙得不休,如皋育德堂(民间慈善机构,贫穷居民死亡无钱埋葬者,由保正证明,经堂董批准,酌量给点费用,可领薄棺一口)的棺材被抬一空。刚死者等着做棺材下葬。天气炎热,丧家惶然,无可奈何!面对此疫情,如皋中医界聘请内科中医徐乃棠、贾莅中、陈其华、祝季平、宋永祥等为义务医师,组成“如皋时疫施诊所”,设于城区西云路巷卢金松宅内。直到秋末降雨,疫势稍杀,患者逐渐稀少而止。据报载,此段时间,苏南的常熟、太仓、嘉定及上海等地亦出现霍乱流行,其势颇为猖獗。

新中国建立后,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,认真贯彻“预防为主”的方针,普遍发动城乡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,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。卫生监督部门大力开展粪便、水源管理,控制污染水源,改善了饮水卫生。同时加强食品卫生管理,加强环境卫生管理,把牢病从口入关。霍乱、恶性疟疾、猩红热等传染病发生率大幅度下降,瘟疫流行的悲惨景象一去不复返了。

话说南通冯旗杆巷巷名

□王其康

地名掌故

为城中公社时被拆掉了,地点是冯旗杆巷东首,现中央商厦的位置。如此看来,这儿正是冯梦龙的原住址,旗杆自然也就是这儿了。

旗杆另称桅杆,升旗之杆。依民国前习俗,科举中功名后,在宅前或宗祠前竖立旗杆,它是功名的象征,作用有二:一是考中后,家族在社会中地位提高,竖立旗杆可以光耀门楣;二是旗杆竖立后,可作为后人学习榜样,激励积极进取。竖立旗杆的资格因地而异,至晚清,此习俗盛行,放宽至贡生就可了。竖立旗杆的排场很大,请唢呐班子吹奏,宴请官员、嘉宾、族老、亲戚等等。不过此风俗南通并不多见,除了寺街据云李方膺之父李玉铉,因为三品官员,曾任福建按察使,在李宅前竖过旗杆外,就数冯旗杆巷的冯宅了。

但是,对《南通市地名录》这段文字,业内曾有专家提出过质疑。孙模老师在责编的2008年《南通市农村文化遗产名

录(崇川卷)》,以及《江苏地方志》2015年第5期的载文,均提出了异议:“除了冯旗杆巷因冯梦龙住宅竖杆而得名之外,另有一说明,‘嘉靖三十年(1551)岁贡,郎西知县冯鸾居巷内,门前竖了旗杆’,与冯梦龙家的情况一样,也因资历不足,再加未见记载,此说也不可信,冯旗杆巷之定名便成为待解之谜。”孙老前輩的异议,后被不少报刊书籍,在涉及冯旗杆巷名称由来时,而引用作为佐证。质疑的文章还有不少,在此不一一例举。对冯旗杆巷巷名由来,与冯宅的“宅前有旗杆”,质疑理由主要有三:一是冯鸾、冯梦龙两人“资历不足”;二是史书无记载;三是“二冯”为两家人。

查阅《冯氏族谱续编》,得知冯氏十二世祖冯梦龙,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就因培养子孙出色,而被封赠教谕,后又诰赠奉直大夫,在不大的南通城,当时他的名望与地位不能算低了;又得知,冯氏六世祖冯鸾,那更是了不得。

小镇大会堂

□何台

老建筑

产小队的干部是队长、会计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们公社12个大队,约160多个小队,另外还有1个街道。70年代中期调整为17个大队、1个街道。

听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说,公社“三级干部大会”一般程序是,先由公社主要领导人作工作报告,或是传达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精神(县里所说的三级干部,是指县、区、公社三级,还是县、公社、大队三级,我没搞清。“区”一级好像是个“软”单位),然后以大队为单位分组讨论。公社除了大会堂,没有小会议室,讨论只能放在大会堂周边的居民家里。公社食堂只有两间屋,小得很,不可能招待与会人员吃饭。吃饭问题,各大队自带粮草,自负炊事员,就在讨论的居民家里借锅灶解决。公社的三级干部会与县里的三级干部会相比,差远了。县里的三级干部会在招待所的大礼堂召开,与会人员统一安排食宿,吃饭有补贴,伙食好得很,每桌五六六个菜,荤菜也不少,糯米粉蒸肉、杂烩汤,对大队干部来说,是很

好的享受了,晚上还能到大浴池洗澡,还能看电影、看文艺演出,开会的那几天比在家里总要舒适得多。

公社大会堂的条件简陋,但却是小镇上最高大雄伟的建筑。大会堂南立面水泥粉刷,呈“凸”字形,“凸”字形上方是红彤彤的五角星,五角星下方是“丁所公社大会堂”七个正楷大字。大会堂南北而立,四周有围墙,南边有大门,西北角有厕所。大会堂里放了一百多张长条凳,凳面是松木方块,凳脚是水泥浇注于地面,一张凳子能坐七八个人,横向放了三张,两张之间有过道,纵向有三四十排吧。大会堂里北面的房子用砖块砌高了,就成了主席台,开会时领导坐在主席台上。南面山墙上用隶书写着“党的基本路线”: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,在这个历史阶段中,还存在着……

大会堂既开大会,也搞文艺演出,也放电影。我的青少年时代,在大会堂参加过三次活动:一是1977年上半年我在农村上戴帽子初中,作为学生代表到公

社大会堂参加喜迎《毛泽东选集》(第五卷)庆祝活动,当红宝书到达大会堂门口时,鸣炮奏乐,锣鼓喧天,场面无比惊人。二是1977年下半年我到公社中学上高中,国庆节前夕,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就在大会堂进行,我们班上的节目是集体朗诵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。三是1979年五四青年节前夕,公社团委在大会堂召开纪念“五·四青年节”大会,那次大会,我作为优秀团员受到表彰。1982年夏天,我还在大会堂看过电影《少林寺》。自那以后,就到外地上学,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小镇的大会堂了。80年代后,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,乡里的干部大会开得少了,大会堂也很少用了。听说,小镇的大会堂于1984年改造为影剧院,设座位800余座,配置了“长江F16-4”放映机。经过若干年的运转,大会堂旧了,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新世纪初,大会堂改建的影剧院作危房拆了。

大会堂,那个曾经的大会堂,留下了全公社(乡)人多少美好的记忆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